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1999
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1999 年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6

ISBN 7-80149-353-2

I. 中… II. 中… III. 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IV. K25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001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1999 年卷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济 春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65139963 邮编100732)

网址: <http://www.sclph.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春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7.25

字 数: 426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353-2/K·035

定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言	张海鹏 (1)
-----------	---------

太平天国后期的朝内纷争

——兼论洪仁 与李秀成之间的关系	夏春涛 (1)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	黄道炫 (17)
英国政府与 1924 年广州商团叛乱	张俊义 (48)

惠栋与清代学术	王法周 (64)
---------------	----------

辛亥前戴季陶的政治思想	贺 渊 (108)
-------------------	-----------

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认识

——章士钊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	邹小站 (122)
张东荪哲学思想的渊源	左玉河 (143)

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传播中的

唯物史观述略	赵利栋 (189)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	罗检秋 (215)
钱穆与胡适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整理的思想交涉	
——以戴震研究为例	刘 巍 (236)
从《读书杂志》看中国社会史论战	李洪岩 (273)

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大学教育述论·····	金以林 (297)
简论北京中法大学·····	葛夫平 (334)
禀德方案与哈佛大学的汉学起源·····	樊书华 (369)
香港社会保障变迁·····	张 丽 (404)
中国抗战时期人口损失研究之我见·····	李学通 (415)
侵华日军暴行心理之解剖 ·····	卞修跃 (425)
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合作社·····	王士花 (452)
评三部梁后超思想研究专著·····	崔志海 (482)
潘光旦家庭问题研究述评 ·····	吕文浩 (525)

序 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1999 年卷，在我所建所 50 周年时问世，我感到由衷喜悦。这是我所响应李铁映院长号召，建设现代科研院所努力中取得的一点进步。所谓现代科研院所，当然有多种含义和衡量指标。照我的理解，首先是要有优秀的研究人才，要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我们通常所说出人才、出成果，当是指此而言。离开了优秀的人才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所谓优秀的研究所云云，不过是无有之乡。因此，建设现代科研院所，我以为第一位的是要有人才。

50 年来，近代史研究所为我国历史学界培养和造就了几代杰出的学者，他们在发展、繁荣我国历史学园地、提高我国历史研究水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在中国通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奉献了许多令我国学术界关注的著作和论文，编出了不少重要的学术资料。不用讳言，这些论著和学术资料对于中国历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到了良好的引导和推动作用。这是我们今天迎接建所 50 周年纪念时，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同样不用讳言的是，我所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困难和缺陷。多年来，老一辈学者常常慨叹，在近代史研究所，青年人才的成长呈现一种自生自灭的状况。这是说，研究所对青年人才的成长，缺乏有力的办法，显得有些束手无策、无所作为。一代一代青年就在这种无奈中或者脱颖而出，或者饮恨出

局。研究所当然不是专业教育机构，不直接负责对人的教育；但是，这并不表示，研究所在教育人、培养人方面不应该承担责任，只能袖手看到这种自生自灭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最近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在研究所内培养和造就青年研究人才的办法。我们认识到，在研究所培养和造就人才不同于学校，不能按部就班进行，不能修学分，拿学位（除了攻读学位，而攻读学位，基本上是接受学校教育，不是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每个研究人员都有研究任务，或者是集体课题，或者是个人项目，都在埋头工作。这是基本所情。因此，我们只能在工作中，只能在研究实践中，考察人，观察人，培养人，造就人。离开这一点所采取的培养措施，都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长久，难收实效。通过研究任务，通过课题管理，通过会议切磋，造成激励机制，形成学术氛围，调动和刺激青年研究者的工作热情，推动他们在研究任务中沉下心来，深入下去，开拓各人的科研园地。为此，所里采取过一些办法，如规定新人进所，要求研究室指定老专家帮带，这是老师带徒弟的传统办法；所里制定过青年研究人员考绩办法，成绩优秀的给予奖励，这是以正面表彰的办法，激励青年人上进；积极在所里实行课题制，推动青年人承担课题，所里给予资助；推荐和介绍青年学者出国做较长时间进修、访问，以扩大其视野，提高外语水平；开办青年学者演讲会，每月定期请青年学者作学术报告；积极推动青年学者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讨论会，要求他们撰写合格的学术论文，同时，本所也积极筹措资金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推动青年学者与会。有时也举办所内的学术讨论会，严格按照国际会议的办法，训练所内青年学者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且，大体说来反映较好。1999年开始，所里又推出一种新的办法，第一次召开了所内青年学者的学术讨论会。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积极响应，大多数人都撰写了论文。会议严格按照国际会议办

法，只是会议主持人、论文评论人都由青年学者担任。会后，请所学术委员会的老专家给予评议，写得好的论文，评出等次，分别给予奖励。这种做法，在所内反映良好。有的超过了年龄的朋友对于自己不能参加会议表示惋惜。这次出版的青年学术论坛，就是本所第一届青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为了免俗，我们名之为青年学术论坛。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近代史研究所现有 40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将近 40 人，其中博士 16 人，硕士要超出这个数字。有一部分已经晋升为研究员，大多为副研究员。今后若干年，大约会保持这个数字，只是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还要增加一些。十年前我们担心的青黄不接的情况，现在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为了使逐年增加的年轻朋友继承近代史研究所的学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初步打算，把这种青年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固定下来，争取每年，或者隔年举办一次，争取每次都出版论文集。青年是我们的未来。研究所的未来在于青年，我国学术界的未来也在于青年。面对 21 世纪国内外学术界的发展，我们要努力推动我们的青年学者尽快地成长，使他们尽早为学术界所认识，所接受，争取使其中一些人成为 21 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名人、大师。为此，我们还要做出更多努力。比如还要在培养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下功夫，使那些即将成为知名学者的年轻人记住、并且发挥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刘大年等老所长留下来的传统，即不仅要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做学问，还要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对国家、对社会抱有严肃的责任感。这是我希望，也是我所老一代学者的共同希望。

本书收集论文 20 篇，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发表。20 篇论文涉及近代政治史、中外关系史、教育史、社会史、学术思想文化史以及学术评论方面的内容。作者中有一位研究员、六位副研究员，其他是助理研究员；他们的研究是认真的、努力的，他们在

论文中的表现如何，研究能力与研究方法如何，他们的论点是否站得住，这就要请各位读者，请各位关心青年成长的前辈们不吝给予指正！

本书各篇论文，在青年讨论会后，又经各位作者修订。本书的编辑工作是本所黄春生、徐秀丽、刘红、曾学白、谢维、杜继东、王立新等做的，我对他们的劳动表示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在很短的时间里出书，我感谢他们的支持！

张海鹏

2000年4月26日

于东厂胡同1号

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传播中的唯物史观述略*

赵利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人们对它的理解屡有变迁。本文主要考察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唯物史观的内容及其演变情况。^①20 年代中国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最初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经济学说三部分组成，以唯物史观为中心，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则是以经济为中心构建起来的经济史观或经济决定论。其后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论战中逐步把意志论的成分引入唯物史观，并进而通过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释，把阶级斗争作为个人意志纳入唯物史观之中。本文试图考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阐释框架是如何逐步形成与建构的。

* 本文为蒋大椿研究员主持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本人所承担“20 世纪 20 年代”之一部分。有关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等人的情况，笔者另文介绍，这里不复论及。

① 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目前有诸多研究成果，如黄楠森主编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 6、7 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北京出版社，1996），桂遵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杨奎松等著《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本文侧重于讨论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唯物史观理论的具体内容及其变化。

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唯物史观

当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之时，《广东中华新报》亦开始连载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文，这便是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①。在文中，杨认为马克思学说是以唯物的历史观为经，以革命的思想为纬，再加上英法等国观察经济状态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的世界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亦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在文章的稍后，他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部分：唯物的历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学说。

1922年，恽生发表《唯物史观底意义》，指出马克思学说的全部思想由三个部分组成：唯物史观、经济学批评、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这三个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并认为第二、第三部分完全是以第一部分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学说全部思想的基础。由此，恽生认为“马克思学说的重心点就在唯物史观，若要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当先明白唯物史观底意义”。^②

1926年，李汉俊等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李在文章中说，马克思是对于现在先进各国社会现象的由来、内容、结果，观察得最切当，研究得最深刻，解释得最透彻的人，由此才创立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是一个完整的大组织，可分作理论和政策两方面，就“理论底方面，又可以分作唯

① 杨匏安：《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杨匏安文集》，第131～1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86。此文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诸多相同的地方，实际上这些论述都来自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著作，《李大钊文集》下卷，第46～85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

② 恽生：《唯物史观的意义》，1922年8月14日《民国日报·觉悟》。

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说三大部分；政策底方面，就是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部分。这中间，唯物史观是关于过去的理论，是研究过去社会组织变化的原因和经过的，亦可以叫做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学说是关于现在的理论，是用分析解剖的方法研究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并预言这组织必然的运命，亦可以叫做资本主义经济论；社会民主主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是研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的，亦可以叫做社会主义运动论。阶级斗争就象一条金线一般把上述三大部分的根本缝合起来，以成就其为一个完整的大组织的部分，马克思学说底有机连结就在这一部分”。李在文中一再强调，要把马克思学说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马克思学说的三部分，无论哪一部分，“如果缺少了其余部分的参照，必不能得到正确彻底的了解。譬如唯物史观，如果没有阶级斗争底参照，就要成为机械论；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如果不和经济学说相参照，就只能得到空洞的观念，亦不能了解现在的社会，尤其不了解将来的社会”。^①

李汉俊的文章很快得到周佛海的赞同。周发表文章说：“本月 6 日，本栏上有我底朋友李汉俊先生底一篇《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入手的方法》……汉俊先生已说明研究这部分时不可忘记那部分，研究那部分时不可忘却这部分，必于研究一部分时而参照其余各部分。”周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学说的三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决不允许承认学说的这一部分而否认那一部分，尤其不可承认它的前提而否认它的结论，承认它的结论而否认它的前提。“我们要知道，马氏学说，乃是一个有机的构成，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不能把一个人底头或两脚砍去，而另换一个头或两脚；我们更不能把人底身体中底一部分斩去，而叫他

^① 李汉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与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1926 年 6 月 6 日《民国日报·觉悟》。

还为一个完整的身体。虽马氏学说底构造庞大，不容易理解；然而我们不能说他那部和那部冲突，和结论无关。”从这一角度出发，周批评了20年代初、中期唯物史观传播中对中国较有影响的两位人物：塞利格曼与伯恩斯坦。在周看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这两个前提引出来的结论，“我们不能否认他底结论社会主义，而承认他底前提唯物主义和经济学；同时也不能承认他底社会主义结论而否认他底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的的前提”，“像美国塞利格曼一样，承认唯物史观而否认社会主义，说马氏底社会主义和他底唯物史观没有关系的，固是荒谬绝伦；就是像德国伯伦斯坦一样，承认社会主义，而否认马氏底价值学说，说马氏底价值学说正否，都不能影响他底社会主义，也难免是头脑糊涂”。^①

早在20年代初期，蔡和森就认为马克思学说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三方面。他说“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② 陈独秀亦持相同的观点。1922年4月，他在上海吴淞公学演讲《马克思学说》时，把马克思学说分为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和劳工专政四部分。^③ 而李达则认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之重要原则有五：唯物史观、资本集中说、资本主义崩坏说、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都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⁵

① 周佛海：《为研究马克思学说者进一言》，1926年6月20日《民国日报·觉悟》。

②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

③ 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

5 李达：《马克思还原》，《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

再来看那些对于马克思学说持反对意见者又是如何看待马克思学说体系的。1919 年 5 月，与李大钊同时发表在《新青年》“马克思专号”上的两篇文章，均对于马克思主义持批评态度。一篇认为马克思学说由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组成，另一篇则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大约可分为三大要点：（一）经济论，（二）唯物史观，（三）政策论”。^① 1922 年，肖纯锦在《学衡》上发表《马克思学说及其批评》一文，认为“马氏之学说，可分为二端：（一）唯物史观，（二）剩余价值论。此两学说，恩吉尔称之马克思之两大发明，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科学者亦以此”。1924 年，刘叔琴撰文认为马克思学说的基石是用辩证法来论证人间的历史，一面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认作历史变动的根本条件，同时认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马克思学说分成三部分：（1）关于过去的是唯物史观，也可讲是社会组织进化论，（2）关于现在的是经济学的批判，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论，（3）关于将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政策论，也可以讲是社会民主运动论，而唯物史观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思想的基础。^②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20 年代初期到中期，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理解基本上是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说三部分，或取其中两部分。而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学说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亦正因为如此，20 年代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唯物史观，次为经济学说。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想法，很明显是受到外来的影响，主要是来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河上肇，当然亦受到一些欧

① 顾兆熊：《马克思学说》；黄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见《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1919 年 9 月。

② 刘叔琴：《唯物史观在历史哲学上的价值》，《东方杂志》，第 21 卷第 1 号，1924 年 1 月。

洲学者，如塞利格曼、郭泰、伯恩斯坦等的影响。^① 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方面是：①阶级斗争在此时并不是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②当时没有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去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体系理解的突破，引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主要是后来由瞿秋白等人完成的。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看成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而以唯物辩证法为出发点，替代早期以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其实，这也是一个理论资源转变的问题，即由主要从日本、欧美输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到大规模输入苏俄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同时，唯物辩证法的输入中国，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即从早期对于经济决定论的讨论转向了从认识论上对于历史规律的探讨，而20年代初期关于唯物史观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意志论与非意志论的讨论亦随之消失。

二、唯物史观理论架构的初建：经济决定论

1919年，杨匏安在《马克思主义浅说》中认为，唯物史观“盖由实在一元论而生之历史自然科学的观察，更使以革命的色彩者”，其关键在于历史发展变化是由于“生产上之变化，而历史时期的划分是根据生产手段（器具机械）而来的，生产的各种形态产生出不同的阶级”。总之，杨指出，唯物史观不仅是专门探讨单独事实，注重零碎的考证，而是透彻讨论“社会生活以何种规律发展，及与天然界的现象有何关系”。就其内容来讲，主要有两点：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之说明，一是社会组织进化论。关于第一点，杨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是社会性的，因而人与

^① 这一点，将另文作较详细的讨论。

人之间自然而然的关系，便成为相应于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一切社会上的政治、法律及精神上的构造都建筑在这上面，并且相应的产生出一种社会的自觉，即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不能决定人类的生活法。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倒可以决定人类的自觉。同时，杨认为在经济基础内部有一种动力促其变化，这便是生产力。对于第二点，杨认为生产力和社会组织之间有密切关系。当生产力发生变化时，社会组织亦必随之而变动。当社会组织是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某一时期，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社会组织不独不能为之助长，势必加以束缚”。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随生产力的日益发展而愈加激烈，结果便是社会革命的发生，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从而所有的上层建筑亦要革命。杨认为，新的生产关系是在旧的生产关系的胚胎中产生的，但如果包含着它的内容的生产力还不到十分发达的时候，其社会经济形体未必立即全部崩坏，高级的新的生产关系必等到孕育这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从旧社会翼下孵化出来后才确立，而社会组织进化的大致程序是依亚洲诸国、上古诸国、封建时代及近世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方法而定。

此后对于唯物史观的阐述大致和上述内容相同。到 1921 年，施存统把唯物史观的要义归结如下：①经济组织（生产及分配方法）是社会组织的基础，一切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精神文化都是建筑在这个基础的上部构造；②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程度，就要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个冲突，社会才有进步。社会革命为的是解决这个冲突，这个冲突解决了，经济的基础变动使上层建筑也跟着变动；③一切精神的革命（不管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的根本原因都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财

产关系) 的冲突。人类因为要解决这个冲突, 所以才发生了精神的革命。一切危险的思想都不过是经济事情的反映; 5 一切阶级斗争 (政治的、思想的、经济的) 的根本原因, 都源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冲突。换句话说, 就是源于经济利害的冲突。人类越是意识到了这个冲突, 越是努力进行阶级斗争, 也就越早一天解决这个冲突; ⑤一切问题只有具备了物质条件时, 才能够解决。①

在稍后的《今日》杂志上, 又有人把唯物史观的要点归结如下: “一、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类社会一个经济的构造, 并且这经济的构造是建设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和与此法律政治相适应的意识状态的真实基础, 所以物质生产的生产方法是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的条件, 人类的意识不能决定人类的社会生活, 社会的生活反能决定人类的意识; 二、不管什么社会, 其物质的生产力发达到某一阶段的时候, 必和其社会关系相冲突而起革命; 三、一定社会里的经济组织, 一经变动, 则在经济上面所有巨大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的全部, 都会跟着他来变动; 四、新社会的物质条件都在旧社会的母胎内所养育而成的”。②此外作者还引用郭泰《唯物史观解说》中的观点, 认为作成社会的基础, 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 是劳动技术; 生产关系同时是一种财产关系, 不仅仅是个人间的关系, 且是阶级间的关系, 这种阶级、财产及生产关系决定人的自觉。

在这些关于唯物史观内容、要点的归纳中, 看不到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似乎一切都是一种纯自然的机械过程或纯粹由经济所决定的, 其立论的根据大抵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并称之为“唯物史观公式”。若再进一步地追溯其理论资

① 光亮:《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 1921年9月8日《民国日报·觉悟》。

② 邝摩汉:《唯物的中国史观》,《今日》第2卷第1号, 1922年7月。

源，则毫无疑问归于河上肇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释及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日译。^① 高一涵顺着河上肇，对于唯物史观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引用了河上肇的唯物史观公式，详尽地解释了生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含义，指出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讲的生产关系是单指“那人类生活上必要的货物的生产而言”，不包括消费、交换、交通、分配以及人类生命的生产；生产力就是指生产的可能性而言，纯粹属于技术的观念；生产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言，即“人类为生产生活上所必要的货物所直接进入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大体上是必然的，一定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在高看来，人类为进行社会的生产，相互之间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而这生产关系形成的结果是：①造成社会的经济构造，②由此决定上层建筑，③形成社会意识，因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可以决定普遍（一）社会的（二）政治的（三）精神的生产过程”。^② 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早期唯物史观的传播中物质与经济是同一含义的。这一点又影响到 20 年代初期唯物史观宣传者对于经济因素的过分重视。

对于经济因素的极端强调，无疑是早期唯物史观宣传中的一个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底特征，一言以蔽之，就在于有唯物

①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经典著作文献及对其的阐释（无论赞成与反对）主要来自日本，其中以河上肇的影响最大。据杨奎松等不完全统计，1919 年 5 月至 1922 年止，中国报刊译载河上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达 30 种之多（见《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第 155～157 页）。据我不完全统计，河上肇著作在 20 年代全本或节译成中文的有 20 种之多（包括同一著作的多种译本）。关于中国译日本书的情况，参看《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年版），特别是第 37～115 页谭汝谦的代序《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关于 20 年代中译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著作的介绍，特别注意第 64～65 页。

② 高一涵：《唯物史观的解释》，《社会科学季刊》，第 1 卷第 4 期，1923。